

文化的输入与演变

鸠摩罗什长安弘法研究

崔峰著



文化的输入与演变

鸠摩罗什长安弘法研究

崔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的输入与演变：鸠摩罗什长安弘法研究 / 崔峰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5

ISBN 978 - 7 - 5161 - 7345 - 9

I. ①文… II. ①崔… III. ①佛教史—研究—中国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312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451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安草堂寺资助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出版资助

序

李利安

早就答应崔峰的请求，承诺为他即将出版的《文化的输入与演变——鸠摩罗什长安弘法研究》一书作序，并想着趁机谈谈自己对鸠摩罗什时代印度佛教向中国输入这一历史进程的一些看法。可是因为事务缠身，一直没有静下心来思考。如今，出版社在等着付印，也只能简单谈一点感想，权作序言了。

记得当初崔峰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曾对他提出一个基本的建议，就是在隋唐以前印度佛教向中国传播这一范围内多做考虑，尤其是希望他重视印度—西域—中国内地这三点一线的传播进路，并特别强调了印度佛教的入华史、中国人对佛教的接收史、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史以及中国佛教发展史都是相互联系但并非相同的概念，一定要注意加以区分。在这些相互交织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隋唐以前的中印佛教关系史中，西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术界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没有从文明交往特别是外来文化的输入和本土民众的接受这一角度来进行系统而有深度的解析。在这种思路下，我和崔峰关于选题的讨论自然免不了反复提及鸠摩罗什的名字。鸠摩罗什祖籍印度，出家后又留学印度，其母后来出家又选择印度为长居之地。与此同时，鸠摩罗什作为西域龟兹国王的外甥，长期在西域各国弘法，后来在凉州停留 16 年，401 年之后又到达长安，晚年一直在这里译经传教。这样的身世和经历正好体现了印度—西域—中国内地这一佛教传播的基本框架。崔峰因此对鸠摩罗什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这个选题其实也暗含着冒险，主要原因是学术界对鸠摩罗什的研究可谓细致入微，已有的资料也几乎是翻了个底朝天，只有在新的视角下，用一种全新的理论支撑，并使用新的方法，这个选题的研究才有可能出彩。崔峰当时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

面对鸠摩罗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卓越贡献，主要有：第一，组织译经，大规模传译印度佛教文化，涉及大小乘佛教的各种不同学说，尤其是将建立在般若学基础上的印度中观学说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为中国佛教提供了大量经典依据，特别是三论宗、天台宗、禅宗、净土宗等宗派的核心经典几乎都出自鸠摩罗什之手，为中国佛教宗派的建立提供了坚强的支撑，与此同时，也为后世佛经翻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二，通过编译、讲解、答问、书信、推崇等途径，宣传佛教教义，弘扬佛教思想，尤其是中观思想，酝酿形成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三论宗，促进了佛教思想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均产生深远影响；第三，以国立译场为平台，以皇室支持为后盾，感召全国各地大量义学高僧云集长安，译经解经，讲说辩论，著书传扬，不但促进了中国佛教的极大繁荣，而且培养了数千具有一定学识的中国僧才，为中国佛教筹备了大量人才资源；第四，通过翻译印度佛教戒律文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的戒律依据，促进了中国佛教僧团制度的不断完善，同时通过建立庞大僧团的实践，为中国佛教僧团制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第五，翻译《普门品》《阿弥陀经》《弥勒下生经》等大乘佛教经典，极大地促进了观音、弥勒、阿弥陀佛信仰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后世中国佛教信仰的主流形态；第六，主动积极地协调政教关系，既赢得了国家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又协助建立了中国早期的佛教管理制度，同时也为后世奠定了一个政教关系的基本模式；第七，通过与印度和西域很多高僧的密切往来，沟通了中国内地和印度及西域之间的联系，搭建了佛教从印度到西域再到中国内地的核心框架；第八，借助与慧远等人的联系，形成佛教学术交流的南北通道，激发了中国人思辨能力，神化了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形成佛教界从未有过的理论辨析热潮。从以上贡献可以看出，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文化历史上的确拥有重要的地位。

鸠摩罗什作为东晋十六国时代同时具备印度—西域—内地三重身份的佛教传播者，在他的身上饱含着那个时代佛教向中国传播的诸多历史内涵。我曾经在陕西省社科院宗教所举办的国家社科基金开题报告会上提出以八种关系作为解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领域诸多重大学术与理论问题的钥匙。以鸠摩罗什为考察对象，这八种关系就是：第一，时空关系。时间方面以鸠摩罗什所生活的年代为界限，同时向前后适当延伸，从而完整而清晰地把握那个特别的时代，而在空间方面，应该以鸠摩罗什先后经

历的所在地为基点，同时宏观统摄印度—西域—中国内地的空间体系，从而充分理解四五世纪时印度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基本轨迹。第二，中印关系。通过鸠摩罗什来考察印度佛教向中国的输入，以及由此所发生的中印文明交往，理解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过程。第三，夷夏关系。前后秦统治者对鸠摩罗什的邀请以及对佛教的支持体现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对佛教的态度以及处理与汉族文化关系的基本特征，这是历史上夷夏关系的典型，对后世佛教文化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第四，内外关系。内学指的就是佛教，外学就是佛教以外的学说。内外关系就是要探讨鸠摩罗什所体现的佛教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如佛教与玄学、儒学、道家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第五，政教关系。鸠摩罗什获得两朝皇帝的青睐，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在政教关系方面具有诸多开创先河的特征。第六，僧俗关系。以鸠摩罗什为首的庞大僧团背后有文人以及官僚居士的支持，而在底层民众之中，也有强劲的呼应，从而形成佛教在当时的发展状态。第七，圣凡关系。尤其是信仰型佛教和义理型佛教的关系，在鸠摩罗什的弘法实践中已经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来了。义学高僧与神异僧人及神异信仰之间相互激荡，共同构成佛教的整体体系。第八，大小乘关系。鸠摩罗什幼年时代从小乘转皈大乘，西域一带大小乘之间关系错综复杂，鸠摩罗什来到内地之后，大小乘经典都有翻译，但始终以大乘为皈，中国佛教也正是在这个时代逐渐开始了弃小向大的明显趋势，并很快完成了倒向大乘的历史选择。

从这八种关系来考察鸠摩罗什的历史作为，可以深刻把握和理解印度佛教向中国的输入以及中国民众对印度佛教的接受。这是从佛教进入中国一直到隋唐时代中国佛教领域最为重要的历史脉络。我在 2013 年香港召开的“中国佛教研究研讨会”上，为了说明民众佛教在中国佛教历史进程中的主要作用，而将中国佛教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2015 年年初在台湾佛光山的人间佛教座谈会上，为了说明人间佛教的历史地位，再次阐释了中国佛教的三期划分观点。所谓三期，就是三个千年。其中第一个千年，从两汉到隋唐，引进、消化、吸收印度佛教，播下佛法的种子，完成理论扎根，在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弘扬的历史进程中，形成文化型与学术型佛教的高度繁荣，主要表现形态是域外僧人的入华传教、中国僧人的西行求法、中外僧人的合作译经、释经、讲经以及信众的写经、抄经、印经、刻经、唱经、诵经、供经等，以及在此基础上主要由高僧大德完成的理论辨析、理论建构、理论推广，呈现出学术化、理论化、精深

化、精英化等特征，从历史主线来看，其核心轨迹堪称学术型佛教。第二个千年，从晚唐五代到元明清，主要是筛选取舍、会通各派、圆融中外，最终形成中国化佛教，并通过渗透社会、深入人心、影响生活方式、塑造精神世界等，形成宗教型佛教的繁荣，主要形态是禅净双雄、重视修行、文化会通、政教呼应、民间普及等，佛教在中国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简易化，并因此而真正实现了民众化。只有实现民众化才能开出现实的花朵，天台、华严即使实现了中国化，但因为没有实现民众化而与实现了民众化的禅宗有了不同的命运走向，而中国化程度很弱的净土宗因为实现了民众化而获得广泛的传播，密宗即使也实现了中国化，但只有其中实现了民众化的部分才获得长久的延续。中国佛教民众化的真正全面铺开是从晚唐两宋时代开始的，一直延续到元明清时期，呈现出圆融化、通俗化、实践化、神圣化、民众化、信仰化的特征。这个千年的佛教，从历史主线来看，堪称宗教型的佛教。第三个千年从民国年间开始，为了对治佛教脱离社会、消极避世、退隐山林、神性弥漫的状态，佛教又开始了新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基本趋向是，在保持佛教本色的前提下，与国际潮流接轨、与现代生活接轨，与永不衰减的精神超越的诉求接轨，在文化繁荣、科学昌盛、经济发达、政治不断清明的时代，勇敢地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在与各种新兴文化形态的对话中，不断调整自己，从而继续发挥其启迪智慧、净化人生、超越现实的价值。这种转变的核心就是不断生活化、现实化、实效化、世俗化，从而形成人间佛教的潮流，从历史主线来看，堪称社会化的佛教。第三期佛教的社会化趋势是诸多背景下的产物。生产方式的革新，社会结构的重组，多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竞争，发展需求的空前高涨，使明清时期的佛教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社会呼唤佛教的革新，佛教也需要革新才能获得生存，佛教以传统文化中三家共同载体和第一代表的姿态，迎接蜂拥而入的新文化的挑战。以上三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最大亮点是文化与学术性佛教的不断高涨，第二个阶段的最大特色是信仰性佛教的主体地位最终确立；第三个阶段截至目前已经呈现出来的主要特征是佛教逐渐向文化与学术靠拢，向主流社会靠拢，向现代理性靠拢。简言之，第一阶段的主导是文化性佛教，第二阶段的主流是宗教性佛教，第三阶段截至目前呈现的最大亮点是社会性佛教，而未来最可能的发展命运很可能是以宗教性信仰为内涵、以文化为载体、以民众为基础、以社会性拓展为道路的佛教。在这三个阶段之中，鸠摩罗什属于第一

阶段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代表着那个时代引进、吸收、消化印度佛教的不懈努力。

记得在香港的那次会议上，李四龙教授从佛教义理发展历程的角度将中国佛教核心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有无问题，二是顿渐问题，三是显密关系问题。这一见解很精辟，尤其是对显密关系的重视，具有更加鲜明的创新性，我认为抓住了唐以后中国佛教的一个重大问题。但如果局限于佛教义理的领域，扩而广之从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可能我们会发现，输入与接受、分立与会通、自力与他力可能会更好地解释中国佛教整体发展历程，因为正是这三次问题转变，架构起中国佛教的历史脉络。隋唐以前的核心问题是印度佛教的输入与中国人的接受。例如净土信仰的传入就经历了从东汉到隋的长期过程，而中国人也是在这一阶段最终确定了对大乘尤其是大乘般若理论的接受。两宋时期圆融思想盛行，出现了大小乘、显密教、各宗派、儒释道、政教学以及精英与民间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圆融会通。而在两宋以后，自力与他力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问题，至少也是核心问题之一。而他力信仰以及建立在这种信仰基础上的中国佛教也是两宋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或主流之一，这种佛教以功利化祈愿、拜忏、超度、往生、因果等方式呈现出来，成为中国佛教延续至今的信仰主体，也是中国佛教最具感召力和神圣性的部分。依次观之，鸠摩罗什正是输入与接收这个阶段中的领军人物。

对于这样一个领军人物，崔峰自有其深厚的感情。他在本书的研究中，全面调集了各种文献资料，努力用文明交往的视角观察鸠摩罗什的所作所为，在印度佛教经过西域向中国内地传播这一历史框架中解读鸠摩罗什的一生。他的这种研究既得益于他多年来在文献方面的丰厚积累，也受惠于他细腻踏实的学风，并在快捷流畅的文笔中得以酣畅淋漓地体现。我相信，在本书的基础上，崔峰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对鸠摩罗什及其所携带的印度佛教向中国传播的诸多历史信息进行更加深刻到位的解读。愿读者从这本书中，既看到一位大师的风采，也看到那个时代印度佛教经由西域传向中国的缤纷历史画卷。

2015年6月5日于西北大学书斋

前　　言

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持续了千年之久，是人类文明交往与传播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也是中印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研究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人很多，成果也很丰富，但真正从两者文化的不同来审视研究佛教传播过程的很少。透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类文明交往的特征，并可以给当今世界各类文明的交往提供某些借鉴。

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在长安口授《浮屠经》，印度佛教逐步传播到内地。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可以看作佛教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大月氏和昭武九姓的中亚各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汉地，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等高僧纷纷来内地传教，带来了中国佛教的初步发展。中国人接受佛教的最初阶层是上层人士，楚王英便是最早的代表。佛教最初发展被中国人视为方术，佛陀与孔子、老子并列视为神仙加以崇拜。汉恒帝在皇宫中就是把这三者作为同等的神祇来供奉的。三国两晋时期，佛教入传仍是缓慢的，这与印度本地佛教发展状况、西域的交通、中国内地的政权文化固然是有关系的。但这一时期的西域的僧人来内地传播佛教者逐步增多，其中竺法护的译经数量超过前人，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东晋时期佛教持续入传，大量的印度西域僧人进入内地，许多佛教经典得到翻译。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佛教仍处于蒙昧状态。许多僧人和居士由于缺少理论指导，不能准确理解佛经中的概念和思想。他们以自己拥有的魏晋玄学基础去解释、领会佛学内容，由此产生六家七宗的派别和分歧。同时大小乘的派别思想也未能及时进入内地，即使当时最有名的道安和慧远大师，也存在着疑惑。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中国佛教的向前发展。他们不约而同地渴求西方高僧来中原传授指导，而鸠摩罗什的东来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实现的结果。

鸠摩罗什来长安后翻译了大量的经典，其中很多的经典是对原来的重

译。由于他在凉州待过 17 年，所以汉语水平很高，他翻译的佛经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因此很多经典得到长期的流传。比如《法华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等后世流行的都是他的译本。同时他还译介了龙树的中观学说，使中国僧人第一次准确领会了般若的概念和大小乘的判教思想，从而改变了中国佛教固有思想的轨道，向着独立自我的方向发展。

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期间二者既有矛盾又相互协调。在印度佛教持续进入中国的同时，一方面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后，有的被接受，有的被冷落抛弃，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印度佛教不断地得到改造和异化，使它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适应起来，并走向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组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底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正是考虑了以上思想，所以在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选取了鸠摩罗什来长安传法译经作为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如果影响最大的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他传译了龙树的中观学说，把中国般若学的认识和研究推向历史的高峰，为中国佛教哲学以后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可能。二是他的传法译经奠定了大乘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基础。从内因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有需要大乘佛教理论思想的因子，但是没有外因也是难以成形的。鸠摩罗什带有明显判教倾向的大小乘观念，让内地僧人深刻认识到大小乘学派的不同，促成了中国选择大乘佛教作为主导方向的道路。三是鸠摩罗什的译经带来了中国佛教的全面传播和迅速发展。他一改前面译经的风格，转为意译，成为中国译经史上划时代的标志。由于其译经的通俗易懂、语言优美，大大促进了佛教经典的广泛流传。为佛教走向基层的普通民众创造了条件，开辟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时代。这也是我们选取鸠摩罗什长安译经传法作为考察对象的重要理由。论文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印度佛教输入的背景，西域在输入过程中的媒介作用，输入的过程，与中国内地文化的碰撞交流，在中国传统潮流中的演变与融合。可以说这一构思是变幻微妙的，既有难度又有精彩之处。因此，博士论文定稿的时候把题目修改为《入传、对话与突破——从鸠摩罗什入华传教看印度佛教向中国的输入》。如果仔细观察这些过程，就会发现印度佛教的输入是有条件的，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环境需求是分不开的，同时二者又发生漫长的斗争融合。本书从鸠摩罗什来长安弘法这一重要事件出发，

深入分析印度佛教文化输入环节，特别关注了两种不同文化交锋碰撞的内容，显得有趣又有意义，然后着重分析了鸠摩罗什所译经典在中国内地的发展演变过程，很好地表达了本书文化的输入与演变这一主题思想。因此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文中的内容，经李老师建议将出版的题目确定为《文化的输入与演变——鸠摩罗什长安弘法研究》。这一题目不仅与内容是吻合的，还能体现当时论文选择的初衷，苦苦寻觅之后终有结果。

学术著作的出版不同于一般的通俗出版物，虽然著者费尽辛苦完成书稿，但出版资金又成问题。幸运的是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西安草堂寺和陇南师专学校著作出版基金两方的资助，基本上解决了版面的全部资金，使得这部书的出版变成了现实。户县草堂寺是鸠摩罗什大师译经的故址，能与之结缘实在是上天注定的因缘和合。陇南师专是我工作的单位，能得到学校出版基金的资助，体现了对我科研的肯定和对本书的关注。在这里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这本书付梓出版之际，我又诚惶诚恐，心情变得复杂起来。由于印度佛教输入中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把握起来十分的困难，不仅需要作者拥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更为关键的是它涉及佛教哲学、历史文献、考古与艺术等多学科的领域。我只能以现有的能力来做，所以书中的有些章节侧重了叙述，在理论的创新上较少，内容与最初的设想和导师的要求差距甚大。这也是我以后努力改进的方面。其次，本书的写作和修改时间仓促，虽然做了完善工作但错误和纰漏还是有所出现，希望能得到专家同人和读者的谅解。

崔峰

2015年6月9日于陇上江南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价值和意义	(1)
二 研究综述	(3)
三 研究思路及方法	(15)
第一章 汉魏晋时期印度佛教的东传	(18)
第一节 汉魏晋时期北印度佛教的发展	(18)
一 贵霜王朝说一切有部的发展	(18)
二 屯宾地区说一切有部的兴盛	(22)
三 大月氏大乘佛教的兴起	(27)
四 中观学说的形成与北传	(31)
第二节 印度佛教向西域的传播	(37)
一 说一切有部在龟兹的传播	(37)
二 大乘佛教向西域的传播	(43)
三 西域南北两道佛教传播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	(49)
第三节 魏晋时期的西域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	(55)
一 西域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55)
二 印度佛教早期输入内地方式的变化	(58)
三 西域对内地的佛教输入及其影响	(61)
第二章 鸠摩罗什的佛学历程	(66)
第一节 鸠摩罗什对说一切有部的学习	(66)
一 对印度说一切有部经典的学习	(66)

二 鸠摩罗什接触的印度说一切有部思想	(68)
第二节 大乘佛学的接收和信仰转变	(69)
一 鸠摩罗什大乘转变的时间	(69)
二 鸠摩罗什对中观学说的接受	(71)
三 鸠摩罗什所接触的大乘经典	(72)
第三节 个人信仰品质的树立	(75)
一 鸠摩罗什对大小乘佛教的认识	(75)
二 鸠摩罗什大乘信仰的成熟	(80)
三 龟兹国王的宗教变革与鸠摩罗什大乘弘法	(84)
 第三章 中国内地佛教的早期发展与困惑	(88)
第一节 印度佛教的早期东传与内地佛教发展	(88)
一 大月氏大乘佛教的早期东传	(88)
二 早期中国的大小乘佛教发展	(94)
第二节 内地佛教发展中的困惑与变革需求	(97)
一 汉魏西晋般若学的发展	(97)
二 魏晋时期的西行求法	(101)
三 道安对中国佛教的疑惑	(103)
第三节 鸠摩罗什长安弘法前的环境因素	(106)
一 前后秦政权的崇佛与稳定的政治环境	(106)
二 道安时代的长安佛学和优秀僧人团基础	(109)
三 吕光西征与鸠摩罗什东来的历史原因再探	(111)
四 鸠摩罗什优秀的综合素质	(117)
 第四章 鸠摩罗什长安弘法的个性品质及文化碰撞	(124)
第一节 鸠摩罗什与姚兴政权的关系	(124)
一 鸠摩罗什早年的政教关系	(124)
二 姚兴政权对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的政治利用	(125)
三 鸠摩罗什对姚兴政权的态度	(130)
第二节 鸠摩罗什与长安僧团的关系	(132)
一 以鸠摩罗什为中心的长安僧团的建立	(132)
二 鸠摩罗什对僧官机构的制约	(133)

第三节 鸠摩罗什与西域僧人团的关系	(134)
一 鸠摩罗什与昙摩耶舍、弗若多罗和昙摩流支的关系	(135)
二 佛驮跋陀罗与鸠摩罗什僧团的关系	(138)
第四节 鸠摩罗什破戒的思想渊源与历史影响	(146)
一 鸠摩罗什破戒的思想渊源	(147)
二 破戒的历史影响	(154)
第五节 鸠摩罗什的道术利用	(156)
一 早期印度、西域传教者与神异道术	(156)
二 鸠摩罗什学习的神异道术	(159)
三 鸠摩罗什对神异道术的利用	(163)
 第五章 中观学说的输入及其产生的文化冲击	(166)
第一节 中观理论和般若思想的输入	(166)
一 中观学派四论的翻译	(166)
二 般若类经典的重译和新译	(168)
三 鸠摩罗什的印度般若思想	(170)
第二节 鸠摩罗什与慧远的对话	(172)
一 鸠摩罗什与慧远思想的比较	(173)
二 两者思想差异的原因分析	(178)
第三节 僧叡对印度般若思想的辨疑	(179)
一 僧叡对印度般若学的学习	(179)
二 僧叡对印度般若学的疑问	(181)
第四节 《肇论》体现了中印佛教文化的糅合	(183)
一 《物不迁论》与中印思想的结合	(184)
二 《不真空论》体现的中印哲学思想	(187)
三 《般若无知论》对中印思想的糅合	(189)
四 《涅槃无名论》的哲学转向	(190)
五 僧肇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191)
第五节 从般若“空”到涅槃“有” ——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发生的大转变	(192)
一 佛教思潮从般若“空”到涅槃“有”的重大转变	(193)
二 转变原因的考察	(196)

第六节 三论学的兴衰	(206)
一 南北朝时期三论学的兴盛	(206)
二 吉藏对中观理论的发展	(209)
三 三论宗在唐代初期的衰落	(214)
 第六章 经典译本的中国流传与演变	(227)
第一节 《金刚经》的译传及其在中国的命运演变	(227)
一 《金刚经》在印度的产生和流传	(228)
二 鸠摩罗什版本的流传	(230)
三 禅宗对《金刚经》的选择和改造	(232)
四 《金刚经》在唐代的流行	(238)
第二节 《成实论》的传入与成实学派的兴衰	(242)
一 《成实论》的传入	(243)
二 《成实论》在中国的流传	(245)
三 南北朝《成实论》兴盛的原因分析	(249)
四 唐初成实学派的衰微	(255)
第三节 《法华经》的流传及其对天台宗的影响	(256)
一 《法华经》的印度产生和影响	(257)
二 《法华经》在南北朝时期的流传	(260)
三 天台宗对《法华经》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268)
四 隋唐时期《法华经》的流传	(272)
第四节 从《维摩诘经》看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276)
一 《维摩诘经》在印度形成	(277)
二 鸠摩罗什译本的流行	(279)
三 南北朝时期的维摩信仰和形象改造	(280)
四 唐宋士大夫与维摩信仰	(285)
第五节 鸠摩罗什所传禅法戒律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	(290)
一 鸠摩罗什传授的禅经及其影响	(290)
二 鸠摩罗什与《十诵律》的传承	(292)
 第七章 超人间信仰的译传及其与中国文化的适应、融合	(295)
第一节 印度观音信仰的输入、传播及其创新	(295)

一 印度观音信仰的渊源和输入	(295)
二 观音信仰的早期传播	(298)
三 齐梁时期的观音信仰	(301)
四 北朝时期的观音信仰	(306)
五 观音信仰类疑伪经的形成	(312)
六 观音性别的演变和香山大悲菩萨的出现	(315)
第二节 阿弥陀经向中国的输入与演变	(319)
一 《阿弥陀经》的域外渊源	(319)
二 鸠摩罗什与《阿弥陀经》的中国译传	(321)
三 从无量寿到阿弥陀称号的转变	(323)
四 隋唐时代的阿弥陀信仰	(325)
第三节 弥勒信仰在中国的发展和变异	(329)
一 印度、中亚的弥勒信仰和下生经的形成	(330)
二 南北朝时期的弥勒下生信仰	(333)
三 弥勒信仰衰落与中国民众的反叛运动	(337)
四 武则天对弥勒下生信仰的利用	(339)
五 宋代布袋和尚与大肚弥勒形象的出现	(340)
第八章 从鸠摩罗什长安弘法看印度佛教向中国输入的特性	(342)
第一节 从需求碰撞到吸收改造——印度佛教输入中国的 基本法则	(342)
一 需要与契机——文化输入的前提	(343)
二 碰撞与吸收	(346)
三 文化的改造与融合	(348)
第二节 媒介、环境与方法——印度佛教输入中国的因子	(350)
一 高僧在中印佛教文化交往中的媒介作用	(350)
二 印度佛教进入中国内地的社会历史环境	(352)
三 印度佛教输入中国内地的方法	(353)
第三节 印度佛教输入的持续性、时代性和整体性	(359)
一 印度佛教向中国输入的持续性特征	(359)
二 中国佛教发展的时代性和整体性特征	(361)
第四节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原则	(363)